

朱绍侯 龚留柱 著

# 盛衰苍茫

汉元成二帝传

七卷出版社

# 盛衰苍茫

## 汉元成一帝传

朱绍侯

龚留柱

著

大象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衰苍茫——汉元成二帝传/朱绍侯, 龚留柱著.  
—郑州: 大象出版社, 2002. 9  
ISBN 7-5347-2721-9

I. 汉… II. ①朱…②龚… III. ①汉元帝(前 48  
~ 前 33)—传记②汉成帝(前 32 ~ 前 7)—传记  
IV. K827 = 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8618 号

责任编辑 郭运庆 吴春霞  
责任校对 张静燕 吴韶明  
书籍设计 张帆  
出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  
发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(电话:0371—5726194)  
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 
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850×1168 1/32  
印张 14.75  
字数 314  
印数 1—2 000 册  
定价 25.00 元

# 前言

西汉政权按其历史发展进程，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。第一个时期，即高惠文景时的恢复、稳定、巩固期，时间从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前一百四十年，共六十五年。在此期间，西汉政权集中力量消灭项羽集团的敌对势力和异姓诸王、同姓诸王的割据势力，以巩固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；在经济上，则采取种种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，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；对外则采取防守、退让的态度，甚至忍辱和亲，以换取边疆的和平；在政治思想方面，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指导，不生事，不扰民，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。事实证明，汉初的政策是成功的。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：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，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，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，揆而不得聚会。』第二个时期是武昭宣鼎盛时期，时间是从公元前一百四十年至公元前四十八年，共九十二年。这时汉政权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，已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，而是要大有作为。对外，积极扩张，打退了匈奴族的侵扰，远征大宛，使西域诸国臣服，并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，开辟丝绸之路，发展与中亚乃至西欧的贸易关系；对

内，继续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，并建立中朝削弱相权，以加强君王专制的买权；在经济方面，加强对盐、铁、酒专卖的控制，把铸币权收归中央，建立起强大的国有制经济体系，形成一个强盛的汉帝国。第三个时期是元成哀平的衰亡时期，从公元前四十八年至公元八年，共五十六年。这期间，元帝则是汉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。吕思勉在《秦汉史》中说：『汉室盛衰，当以宣、元为界。』可谓一语破的。汉宣帝以前和汉元帝以后，汉帝国的形势截然不同，盛衰的转折迹象十分明显。这种转折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，皇权的削弱，对外政策的收缩，土地兼并的再起和社会矛盾的加深等方面，下面就扼要谈谈这种转变的情况。

## （一） 儒家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

过去都认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『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』，从此儒家思想便立为一尊。其实汉武帝并没有重用过董仲舒，儒家思想也没有立为一尊。在武、昭、宣三帝时期，政治指导思想实际是儒法并用，德刑兼施。如果更准确地说，则是外儒内法，阳儒阴法。表面讲德政，实际是法治。只有到汉元帝时期，儒家思想才成为政治主导思想。这种转变最典型的例证，就是汉宣帝和太子刘奭（后来的元帝）的一段对话。刘奭为太子时，对其父任用文法吏，采用严刑峻法的统治政策颇有异议，曾当面对宣帝说：『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』宣帝一听大怒，说：『汉家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

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。」并且叹息道：「乱我家者太子也。」①宣帝的话可以说是对武帝以来汉家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。所谓「霸王道杂之」，就是把法治放到首位，辅之以德教，实际就是外儒内法，而对俗儒「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」的批评，可以说是抓住了儒家的要害，特别是「乱我家者太子也」一段感叹语，竟不幸而言中，元帝即位后果然任用儒臣，标榜儒术，汉政局确也急转直下，迅速走向衰亡。

秉公而论，不能说儒家思想、儒家政治一无是处，更不能把汉家的衰亡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和儒家政治，其实儒家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方面，确实有一套较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。如主张轻徭薄赋，爱惜民力，为政以德，仁人爱民以及大一统思想和「知不可为而为之」精神，等等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儒家的致命弱点是保守、迂阔，而俗儒又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使儒家的仁治善政也成了虚伪的说教。总之，要探讨汉政权衰亡的原因，不能单纯归之于儒家学说，而要看到更深刻的社会原因，特别是统治阶级的腐朽性，才是汉政权衰亡的真正原因。汉元帝就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俗儒典型，汉成帝则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，汉政权的衰亡，元、成二帝有不可推脱的主要责任。

元帝即位后即重用儒臣，名儒萧望之、周堪、贡禹、匡衡、韦玄成、刘向、郑弘皆为卿相，推行儒政。其间也确实推行过一些仁政，如提倡节俭，减少政府开支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削减卫卒，生子由三岁出口钱，改为七岁乃出口钱；成帝时，算赋由一百二十钱，减为八十钱，等等，都堪称为善政。还

有扩大博士弟子名额，令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官中藏书，等等，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，都是有益的措施。同时京房提出的『考功课吏法』，如能认真执行，对于政治清廉，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，也应该有所裨益，但是，由于儒家的保守、迂阔及讷纬迷信的消极作用，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，元帝优柔寡断，使儒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，而它的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，再加上统治阶级腐化堕落，政治黑暗，使汉王朝统治迅速走向衰亡。

儒家的迂阔、保守、迷信的表现，首先是把日食、月食、地震及水旱灾害等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。如翼奉给元帝上封事时就说：『《易》有阴阳，《诗》有五际，《春秋》有灾异，皆列终始，推得失，考天心，以言王道之安危。』①所谓『五际』，即指每逢卯、酉、午、戌、亥五个地支年份，国家必有灾害发生，称为『五际厄运』。翼奉认为元帝初元二年（前四十七年）就是甲戌年，属于『五际厄运』之年，故地震频繁，阴气大盛。所以如此，是由于『二后之党满朝，非特处位，势尤奢僭过度』②之所致。论说以灾异附会政治，以约束君主政治之失，虽属迷信，但也未尝不有积极意义。前此翼奉曾因天变而劝元帝『显诸仁，藏诸用』，即行仁政，节用爱民，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见，下诏『江海陂湖属少府者，以假贫民，勿租税，损大宫膳，减乐府员，少苑马，诸官馆稀御幸者，勿缮治，太仆、少府减食谷马，水衡省食肉兽』③。而这一次涉及到外戚史高、许嘉所谓『二后之党』专权干政的严重问题，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见了。初元三年四月乙未，武帝茂陵

①②③ 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翼奉传》

白鹤馆火灾，翼奉又上疏建议因天变而徙都于成周（洛阳），以表示『与天下更始者也』，从而使汉家政权『延长而无穷也』<sup>①</sup>。其实天变与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，翼奉把两者拉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，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。这回元帝还是没有接受意见，以七庙在长安不能东徙为由拒绝迁都。

在翼奉之后，易学大师京房又借天变之机，上奏『考功课吏法』，说：『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，瑞应著；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，宜令百官各试其功，灾异可息。』<sup>②</sup>本来为整顿吏治，惩治官吏胡作非为，建立考功课吏法是十分必要的，但京房把它与天灾联系起来就显得节外生枝，而优柔寡断的元帝，听从了宦官和权臣的意见，不仅没有推行考功课吏法，而且借故把京房处以死刑，说明儒家借天意说教的政治，对事实毫无补益，只是徒增人们的困惑而已。

汉代儒臣对治理黄河和自然灾害表现得也很迂阔、保守。如公元前一百三十二年黄河在瓠子决口，河水南流，造成十六郡受灾，当时的丞相田蚡就反对堵塞决口，其理由是：『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为强塞，塞之，未必应天。』<sup>③</sup>当然，田蚡说这样的话是别有用心的，因为他的封地鄃县（今山东平原）在河北，河决南流对他有利，因此假借天意反对堵塞决口，恢复黄河故道。到了成帝时期，以天意为由反对治理黄河的人就更多了，如谷永认为灾异是『皇天所以谴责

① 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翼奉传》。

② 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京房传》。

③ 《史记》卷二十九《河渠书》。



人君过失』<sup>①</sup>，还说：『河，出国之经流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竭绝。』故对水灾不必治理，只要『修政以应之，灾变自除』<sup>②</sup>。李寻、解光也认为水灾是『天道有力而作也』，对于决口，『可且勿塞以观水势……然后顺天心而因之，必有成功』<sup>③</sup>。这些借天灾警告皇帝革新政治的言论，在治理黄河方面则是有害无益。

还有人在治河上采取『循经法古』的方略，凡是古书上没有记载的河道，就不能开辟，凡儒经上没有记载的治河方法，就不能采用。如贾让认为『善为川者，决之使道（导），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』，而『堤防之作近起战国，壅防百川各以为利』，很不可取，于是他就提出一个治水上策，即决开河堤，任水横流东入海。他置『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』于不顾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是『遵古之圣法，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，而不相奸（干）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！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』<sup>④</sup>。多亏贾让还有治河中策、下策，否则仅此上策，就没人敢于治河了。再如公元前三十九年，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堤，屯氏河被堵塞，有人建议重新疏通屯氏河，使河水分流以减轻水害，而河堤都尉许商则坚决反对，认为屯氏河是黄河溢流形成的水道，与古经《禹贡》不合，而主张要寻找古说九河故道，结果成帝和他的儒臣们为寻找、考证『九河故道』，使黄河水患又拖延了十几年。

在成帝时期，幸亏有一位买干的治水专家王延世，他不顾俗儒的干扰，两次治河立了大功，才

① 《汉书》卷八十五《谷永传》

②③④ 《汉书》卷二十九《沟洫志》

使泛滥的黄河暂时得到治理。

在对外关系上，儒家一贯主张以德服人，反对武力征服。故当匈奴出现内乱时，有人认为『匈奴力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趁兵灭之』，萧望之则坚决反对，认为『不以义动兵，恐劳而无功，宜遣使者吊问，辅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四夷闻之，咸贵中国之仁义……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』<sup>①</sup>。本来在对外关系方面，不以实力为基础，而空谈仁义，也属儒家的迂腐之论，但在元成之世，国力衰弱，对外采取收缩政策，而不穷兵黩武，使国家得到安宁，未尝不是适时之论。

在政治措施方面，儒家一般偏于保守，反对改革。元帝重臣匡衡说：『论议者』争言制度不可用也，务变更之，所更或不可行，而复复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民无所信，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，而虚为此纷纷也』<sup>②</sup>。不可否认，儒家也有托古改制派，王莽就属于这一类儒者，但在元成时期，改革派还不占上风。

从元帝开始，儒家思想成为汉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。说来儒家的运气不好，在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，就遇上了元成二帝这样柔弱、昏庸的君王，因此其积极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，而其消极方面却得到恶性发展。汉元帝实际是一位叶公好龙式的儒家信奉者，他并不真正信任、重用正直的儒臣，而是把大权交给了乱政的宦官，儒家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采纳、执行。相反他竟容忍（如果不是纵容的话）把他的师傅，受人尊重的名儒萧望之迫害致死。其他大儒、贤臣或被

①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。

② 《汉书》卷八十一《匡衡传》。

处死，或遭禁锢，在此情况下，有些趋炎附势的俗儒则投靠了宦官，汉家的衰亡，已势不可免。

## (二) 宦官外戚干政

宦官、外戚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肌体上的两个毒瘤。他们专权得势，必须借助于皇权，依附于皇权。宦官、外戚往往利用皇帝幼弱、昏庸或母后临朝听政的机遇，以有条件接近皇帝、皇太后的特殊身份而篡权得势。宦官本是刑余之人，并无政治才干，外戚则全靠裙带关系，他们一旦得势，必然结党营私以巩固自己的权势，而排斥、打击、陷害忠贤之臣。宦官、外戚之间，有时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有时相互倾轧，勾心斗角。所以宦官、外戚专政，就意味着封建统治政权更加腐朽、黑暗。从元帝开始西汉政权逐渐趋于衰亡，与宦官、外戚干政应有密切联系。

在西汉，宦官登上政治舞台，应从武帝时开始。史称「(武)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，故请奏机事，多以宦人主之」<sup>①</sup>。但汉武帝雄才大略，皇权独揽，宦官也只能起到政事传达的作用，而不可能操纵皇权。到了宣帝时期，因宣帝「不甚从儒术，任用法律，而中书宦官用事」，故明司文法的中书令弘恭、中书仆射石显得以「久典枢机」<sup>②</sup>。但宣帝本是中兴之主，「信赏必罚，综核名

① 《后汉书》卷七十八《宦者列传》。

②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。

买」①，英明果断，大权在握，宦官也不可能兴风作浪。到了元帝时期，由于他仁弱无能，「优游不断」②，宦官弘恭、石显才得以专擅朝政，扰乱政纲，不仅元帝的儒家「仁政」无法实现，而主持仁政的儒臣，也惨遭迫害，汉家的政治危机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。

本来宣帝在临终前，对后事的考虑是比较周到的，下遗诏令外戚侍中、乐陵侯史高，太子太傅萧望之，太子少傅周堪共同辅政，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萧望之为前将军、光禄勋，周堪为光禄大夫，同时令三人并领尚书事。这就是说在元帝即位后，军政要事可由史高、萧望之、周堪全权处理。对于这个辅政班子的安排，宣帝既考虑到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才干，也考虑到他们与皇室的亲密关系，当然也有互相制约的含意。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，宣帝幼时长在史家，亲情不比一般。萧望之、周堪是元帝的师傅，都是当时名儒，深谙政事，所以宣帝对于这三个人辅政是非常放心的。元帝在即位之初，萧望之、周堪对国家治乱大事都陈述过很好的意见，也深得元帝的信任和尊重。萧望之又「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」，还引进「宗室明经达学」之士刘更生、侍中金敞共参朝政。史称「四人同心，谋议劝道（导）上（元帝）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」③。如果元帝能够专任萧望之、周堪等忠直之臣，尽管他们动辄言「古制」，有迂阔的一面，汉家政治还不至于那样迅速地衰亡下去；但元帝虽然表面上对萧望之、周堪两位师傅的建议「甚向纳之」，实际

① 《汉书》卷八《宣帝纪赞》。

② 《汉书》卷十《元帝纪赞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。

并不真正信任，甚至还感到受掣肘，而对于宦官石显，认为『中人无外党（师古曰：少骨肉之亲，无婚姻之家也），专精可信任，委以政，事无大小，因显白决』<sup>①</sup>。实际上将政治决定权完全交给了石显。

元帝初即位时，宦官弘恭为中书令，石显为中书仆射。弘恭病死后，石显就升力中书令，总揽中书大权。从此石显贵幸倾朝，百僚皆敬事之。史称石显『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探得人主微旨，内深贼，持诡辩以中伤人，忤恨睚眦，辄被以危法』。<sup>②</sup>看来石显是一个很可怕的阴险小人，他奸诈、狡诈、毒辣，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，阿谀奉承，陷害忠良。石显为了扩大实力，又与外戚史高相互勾结，处处与萧望之、周堪等执政大臣对立。萧望之知道石显『专权邪辟』，就向元帝提出建议：『以为尚书百官之本，国家枢机，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』<sup>③</sup>意思是要以贯通古今廉明公正的儒臣来代替宦官。又说：『用宦官非国旧制，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近刑人之意。』<sup>④</sup>但元帝并没有接受萧望之的建议，从此石显与萧望之结下不解之仇，时时想乘机陷害他，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不久，有个会稽人郑朋想要依附萧望之，上疏揭发史高『遣客为奸利郡国，及言许、史子弟罪过』，并赞颂萧望之『体周召之德，秉公绰之质』<sup>⑤</sup>等等。开始萧望之还接纳了他，但后来知道郑朋乃是奸邪之人，便不肯再接待，提拔他了。郑朋恼恨在心，又转而投向史高，石显，并诬称是萧望之唆

①②③ 《汉书》卷九十三《佞幸石显传》。

④ 此段引文乃据《汉书·石显传》《萧望之传》综合写成。

⑤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。

使他揭发史高、许章的罪过。于是石显就利用萧望之「出休日」（休假）之机，上奏元帝，说：「望之、甚、更生朋党称举，数譖诉大臣，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擅权势，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谒者召致廷尉。」①据说元帝不了解「召致廷尉」就是逮捕入狱，便糊里糊涂地批准了石显的奏章。不久当他得知周堪、刘更生入狱的消息时才大吃一惊，又责问石显奏事不清，并让石显把周堪、刘更生放出来。当朝大臣说抓就抓，说放就放，成何体统？但石显并不满足这次对萧望之等人的折辱，随后又以萧望之之子萧伋为其父上书申冤为由，上告萧望之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」②，并说萧望之自以为皇帝，有罪也不会判刑，要求把萧望之投入监狱，「以塞其怏怏之心」③，然后再放出来，以显示皇帝的「皇恩浩荡」。元帝明知萧望之性格刚强，不肯面对狱吏接受审问，但还是听从了石显的花言巧语，批准石显派执金吾包围萧府去逮捕萧望之。望之不肯受辱，饮鸩自杀。

有的学者认为元帝对石显迫害萧望之是故意装糊涂，说元帝「即位时已二十七岁，即使初即位时也不可能连「召致廷尉」这样的话都不懂，更何况元帝决不是白痴，而是「多才艺，善史书」，颇有些才华的君主。而所谓「善史书」就是「指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」。「召致廷尉」应当是文吏掌握的基本术语。以元帝之才，若连这句普通术语都不懂，是很难令人置信的。其实，这正反映了元帝的无能和狡诈」④。实际上元帝不仅是对萧望之「召致廷尉」装糊涂，而且对萧望之的自杀也要负责。他明知萧望之性格刚强，不肯面对狱吏，还要下令去逮捕萧望之，况且已有

①②③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

④ 林剑鸣，《秦史》下册二十四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

过一次「召致廷尉」的教训，为什么还要相信石显的诬蔑不实之辞？所以萧望之的被迫自杀，即使不是元帝的预谋，也是支持石显的结果。至于萧望之死后，元帝「乃却食，为之涕泣，哀恻左右」，「有诏加恩，长子伋嗣为关内侯」<sup>①</sup>，等等，都是虚伪的欺骗。这是杀了师傅又怕留骂名而要的两面派手法，其实元帝是自毁江山。

萧望之死后，周堪、刘更生也被废为庶人，「废锢不得复进用」<sup>②</sup>。此后石显更是为所欲为。忠骸之臣如张猛、京房、陈咸、贾捐之、苏建等皆遭迫害，或自杀，或弃市，或以他事论死，或抵罪为城旦舂，「自是公卿以下，畏显重足一迹（师古曰：言自恐惧，不敢自宽纵）」<sup>③</sup>。石显还与中书仆射牢梁、名儒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羽，逆之者非死即废，依附者皆得宠任，故「民歌之曰：牢邪石邪，五鹿客邪！印何累累，绶若若邪」<sup>④</sup>！说明石显集团兼官据势，显赫一时。总之，在元帝在位的十几年中，政权完全操纵在石显集团手中，政治黑暗，国势衰微，元帝不能辞其咎。

公元前三十三年，元帝去世，成帝即位。不久成帝就将石显中书令职免掉，后又令其徙归故里，失势的石显忧郁不食，死于途中。石显的党羽也先后被罢官，从此结束了宦官专权的局面。但皇权并未因此而复振，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戚专政。

外戚专政，在西汉也并不是成帝时才出现的，汉初的吕氏专权姑且不论，昭宣时期的大将军

① 《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萧望之传》。

② ③ 《汉书》卷九十三《佞幸石显传》。

④ 《汉书》卷九十三《佞幸石显传》。

霍光执政，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权。尽管霍光也飞扬跋扈，排斥异己，但他执行的是汉武帝既定的方针政策，并且励精图治，而昭宣二帝也非庸碌之主，所以在昭宣时期，外戚专政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破坏性的作用，相反还出现了『昭宣中兴』的局面。然而成帝时的外戚专政则完全不同，政治黑暗，社会动乱，最后导致了王莽篡权和西汉政权的灭亡。

汉成帝为太子时，就是一个『幸酒，乐燕乐』之徒，即位后更『湛于酒色』<sup>①</sup>，不理朝政，把政治大权拱手让给外戚王氏之手。

成帝母王政君是个贪恋权势的女人。成帝即位后她升为皇太后，于是乘机抓权，任命其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总揽朝政，从此开始了外戚专政局面。

王政君有弟兄八人：王凤、王曼、王谭、王崇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。王曼早死，留有一子即王莽。王政君先封他同母兄弟王凤、王崇为列侯，又封其他兄弟为关内侯。至公元前二十七年，又将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同日封为列侯，世称『五侯』。『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，分据势官满朝廷』<sup>②</sup>，把持了汉家政权。

王凤掌权后，首先排挤掉另一外戚许嘉，接着又唆使人上告宣帝的舅舅丞相王商，并以虚构的『闺门内事』<sup>③</sup>为由，迫使成帝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。京兆尹王章对王凤的专横十分不满，上疏

① 《汉书》卷十《成帝纪》。

② 《汉书》卷九十八《元后传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八十二《王商传》。



力王商申冤，并揭发王凤很多罪行。成帝也感到王凤威权太重，想要免去其大将军职务。王太后听说后，『垂涕，不御食』<sup>①</sup>。成帝迫于母后的压力，不仅没有撤掉三凤，反而让尚书劾奏三章诬告大臣，遂以『大逆罪』把王章打入牢房，章终死于狱中。『自是公卿见凤，侧目而观』<sup>②</sup>。无人再敢触犯王凤的淫威。王凤结党营私，排斥、陷害忠良，卖官鬻爵，公行贿赂。王氏党羽莫不穷奢极欲，鱼肉百姓。成帝虽然在政治上信赖王氏诸舅，但对他们骄奢过度，也深力不满。当得知王商穿长安城引泂水入府第，王逢时于园中修土山榭台类似白虎殿等骄奢逾制不法行为后，愤怒地向王氏诸舅质问，王晋、王商、王根兄弟非常恐慌，『欲自黥劓谢太后』<sup>③</sup>。成帝明知王商等人是要扶太后以求免罪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于是就使尚书去责问司隶校尉和京兆尹，问为什么知道王商、王根等骄奢过制而不检举？还向尚书了解又帝时诛灭外戚薄昭的旧事，暗示要从重处罚王氏外戚，王晋闻讯更力恐惧，『皆负斧质』请罪。其实成帝完全是虚张声势，最后以『上不忍诛』<sup>④</sup>了事，王氏集团奢侈如故。

成帝在位期间，王氏诸舅王凤、王晋、王商、王根相继辅政。虽然不能说王氏外戚辅政没办一点好事，但其政治主流是腐朽黑暗，社会危机逐步加深，又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公元前八年，王根以年老告退，推荐王莽代他辅政。此时王氏外戚在王政君的庇护下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尽管在哀帝时期，王莽为避丁、傅两家外戚势力，暂时一度隐退，但哀帝一死，王莽又在王政君的支

①②③ 《汉书》卷九十八《元后传》。

④ 《汉书》卷九十三《元后传》。